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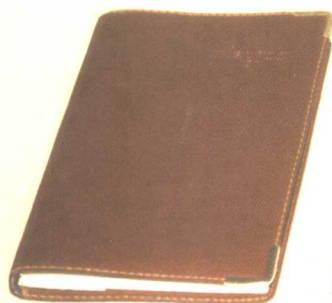
ZHAO HUA

朝华管理学院
学术文库

中国 私人资本人格

总裁笔记之一

CHARACTERS OF CHINESE
PRIVATE CAPITAL
CEO'S NOTE(1)



单元庄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席执行官私人笔记。当代中国最
关注。又对中国经
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国私人资本。而制
值理念。行为追求
其内在心理和外
境合力塑造的资本
那么。重归“幼年
的中国私人资本生
可种生态环境之中
其精神行为的当代私
本人格具有何种特征
人资本人格外化实现
能本质、功能角色。
价值追求又是什么？
如何公正评价既展
辉煌。又屡蒙非议的
调的资本行为？新
体应如何在追求“资
正”中实现自我优化
越？在未来发展中私
本将可能面临何种社
态环境。进行怎样的
传承？面对上述时
课题。作者以总裁。
者、教授的多重角色
入私企。和10年实务
与思考。做了系统论
提出诸多有别时论的
与观念。可供企业和
织管理者、领导者
政策研究者、高校
相关专业研究生参



朝华管理学院·学术文库

中国私人资本人格

总裁笔记之一

CHARACTERS OF CHINESE PRIVATE CAPITAL
CEO'S NOTE (1)

单元庄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私人资本人格 总裁笔记之一 / 单元庄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5. 11

(朝华管理学院·学术文库)

ISBN 7-80190-578-4

I. 中... II. 单... III. 私营企业—资本经营—研究—中国
IV. 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959 号

序 言

但凡“序言”总行文于结稿之后，这于我也不例外。之所以若此，在我看来，一则写作本身是思维进一步拓展提升，理论进一步深化凝练的过程。起笔之初的谋篇布局，立论选题，于铺述途中总会拾遗补缺峰回路转，待结句杀青之时，可能已是形神俱变，面目全非。而“序言”既要提纲挈领综述全文，自然应成文于定稿之后。另则，为文之事，总需专注与凝重，特别是做理论文字，一般较少文学作品的灵感骋翔，妙笔神来，满纸锦华，而不免古奥艰涩，枯燥刻板，于字斟句酌之中发微穷义，自己是如牛负重，又拉着读者一道去费心费神费时费力。故于正文铺就之后多如释重负，舒身展气，总想变一个身份换一种氛围，将读者做益友良师，以真诚坦率之心，做一番促膝交流，说些与正文有关但却较为轻松的题外话语，这也正是我写“前言”的本意。自然，由于要做综述提要，总需涉及一些相对艰深的论点论题，于轻松之中，夹裹些许厚重，只好请读者包涵。这算是“序言”的序言。

一 缘起：走出“主流体制”

至收笔时，我对中国私人资本及其经营者群体的认识，始终以这一新经济、新经济群体同其所处时代、所依存社会主体形态的互动关系为辨析基础。而全部认知——不论是粗糙还是精细，肤浅还是深刻，又都与我在“不惑”之年做出的曾令亲友备感困惑，又大受质疑的选择有关；与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主流体制”，又一次复归社会最低层，从“零”开始自

我人生“第三季”的实践有关。因此，在陈述思想收获之前，我想将这段“出走”与感受做些许交代。从这些许交代中，读者也许会对书所述观点、理论给予更多的理解。

直到我“下海”9年之后的春节，旧时下乡的同学们聚会，席间一位同在大学校园长大的“发小”对大家说：“谁下海都可以理解，惟独老单下海让人想不到，不可理解”。也许这句话将我的前半生及我的“正统”人格从一个侧面做了概括，颇有一些道理。不过，有道理却又不为大家理喻的事毕竟发生了。下乡，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①当生产队长，十足的“老”农民，胡子麻茬的“老”学徒，一心想读大学，却因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结缘而被拒之门外。偶然间做了大学教师，以高中生身份在儒雅之堂一站10多年。1980年代中补修完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198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以后边教书边做管理工作，在学校负责航空工业系统部分大中型企业领导干部上岗培训，而后转入国家经贸委系统负责全国设备管理干部培训，一路顺风地向“上”走。直到“六四”后，有感于传统教育体制的禁锢和传统治学的脱离实际，也是为经济领域民间私有经济的快速崛起所吸引，又一个偶然，便半推半就地下了“海”，到一家我去之后不久便成为中国“福布斯”头榜第一名的私有企业做总经理，在企业实务体验与考察的同时，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与研究之路。

无知者胆大，这对我是恰如其分。当时我是正值“春风得意”，这种急剧和大跨度的转变搞得几乎所有亲朋好友莫名其妙；而我也相信，像我这样来做学问的在学界恐怕不多。现在看来这种大转变一半是书生气十足一半是出于幼稚的理想主义，却暗合了社会转型的潮流。可当时我却以柳青写《创业史》到农村蹲点为参照，自信这是做学问的应由之路。等到下去之后才发现，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意想不到”和一次又一

^① 指“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者的子女。

次的生存常识“再教育”。

说来让人发笑，首先一个“意想不到”是做学问先要有饭吃。这绝非是在说笑话，而是我当时面临的无情的现实。20多年教书生涯在我和我的同侪身上留下的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是：长期生存无虞，我们几乎忘记了做学问先要有饭吃，进而几乎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到了私有企业才发现，我几乎失去了旧有的一切：劳保福利姑且不论，公售房没了，20余年的大学教龄没了，行政级别与待遇没了，进一步“升迁”更是绝了缘分；不仅如此，如果与“老板”处不好，只等卷铺盖“炒鱿鱼”了。我这才发现，这个学问“创新”创得我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最重要的是生活与环境的巨大变化开始使我猛然觉悟到，我已走出了“主流体制”，不仅目标价值、伦理准则、行为关系、发展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从今往后不再依靠国家提供的虽不算丰足但无生存之虞的条件，必须以“自由职业者”、独立谋生者的身份，通过无任何保障的出让智力来换取生活资料，支持家庭的生存与自己的研究。此时，骤然醒悟而引发的心理不平衡之强烈，可谓刻骨铭心。我渐渐意识到这条新路的风险可是够大的：一旦失去生计，我将无以为续。面对自求生计以支撑生存与研究的窘迫，我开始真实地感受到古往今来知识者的生存局限，看到了“生存戒杖”与自由思想之间的无形而微妙的关系，开始理解了古希腊“犬儒主义”同比附了诸多世俗语义的现代“犬儒哲学”的本质差异。

好在我与这家私有企业董事长的关系“处”得较好，同为知青，算是同龄人，总有着一些共同的语言与思想基础，都想把企业做大做好的目标追求，使我们之间建立了颇特殊的友谊与关系。然而我的两鬓却在“走出主流体制”后短短的几个月开始发白了。此时的困窘实在一言难尽。以致每当提起这段生活，老人与家人总不免是半晌唏嘘。不过，物质方面的窘迫倒还可忍受，精神上的骤然“贫困”却是可怕的。由于几十年生存于一种稳定的组织体系之中，现在突然像一颗脱离轨道的星球，失去任何依托，驰入了茫茫无际的太空，一种失去惯性，失去组织归属的失落感，尤其是失去了在旧环境、原有价值体系中业已形成的目标价值、精

神追求与寄托的迷惘空虚在内心引起的惶惑，是无以名状而又十分沉重的。今天，我已经适应了这种“自由”状态，并在自创的组织群体中找到了新的依托，进一步地从新的组织行为关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行为自由，真正开始做许多人至今絮絮叨叨埋怨，没完没了期盼，却又无可奈何放弃的“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我还是要承认，当时的境况在我的心头添加的压力是巨大的。这种心理重负加上后面讲到的家族壁垒、理论尴尬、身份歧视等等，使心理天平的倾斜几乎到了一边无穷大，一边为零的极致状态而变得异常可怕。当许多同事亲朋看到我后来在“凤凰卫视”做嘉宾主持，受聘财政部做全国特大国企绩效评估专家，被珠海市委市府聘为咨询专员而为我高兴时，他们并不知晓我在迈出这一步后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磨难。2002年，在按自己的理论体系给研究生讲授《组织行为学》，并“现身说法”地讲述“下海”后失去旧有组织依托、组织归属，又未被新组织接纳时的心理冲突时，在不少学生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乃至有同学以此为论题，做了一篇有一定深度的学位论文。看来，这种意想不到的心路转折和高昂的组织迁移心理成本支付并非我一人，而多少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在学界较少同行者罢了。因为说到底，这是时代、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阶层变迁的自然心理反应，也是传统社会心理所崇尚的群体依附、组织归属、精神惯性的正常反应。

给予我另一重“打击”的是，我没有想到，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的理论体系在新的环境里，在我所在的福海集团公司，在我所重点考察的10多个企业和我所熟悉的朋友的公司里屡屡碰壁——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的设置更多是因为独资企业的资本积累不如股份制来得更加快捷便利；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生涯设计遇到了血缘、地缘关系的拼命抗击；公司财务在“两本账制”面前一筹莫展；“向管理要效益”自然地屈从于经营新项目获取的巨大收益；激励理论与领导风格被相互制约的直线报告制度嘲弄得无地自容；绩效评估服从于亲疏远近的人情世故考虑……我不否认，在我曾经考察过的一些企业，并不乏规制约束与规范运作，但我更多看到的是现代西方管理精粹如何在近代传统家族制度、近代东方文化习俗、近

代作坊式操作所编织的厚重坚韧的文化藤盾前败下阵来；我承认“不规范”是私有企业普遍存在的缺陷，但我的一位只有高中文化基础的学生，带着百十号最高学历是电大本科的技术队伍，一年间叮叮咣咣地打出了比一家有数千号员工的高技术国防企业还要骄人的业绩。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我也不否认无数装饰豪华典雅，员工衣冠规整，行事有序，充满“西洋神气”的诸多合资企业、中资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在学习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过程中对西方管理理论的纯熟套用。然而我对其表层的范式及理论的真实效益总要大打折扣。因为，谁都知道，特殊权力、特殊政策、特殊关系在这中间同时发挥着多么巨大的超经济效力。

理论，我所期望指导企业实务的理论，我曾在学校一再重复宣讲的理论，在现实面前表现的是如此苍白，如此无力。我常听到理论界流露出对私企经营者素质的感叹，但我更多看到的是实业界对理论家们的失望，对我们培养的 MBA 的失望。

感叹与失望，究竟哪种更符合实践的客观性，更具现实意义呢？

我敬重西方理论界几百年的辛勤耕耘和对世界文明的不朽贡献，敬重中国理论界为引进西方先进理论所付出的努力。但现实对理论的态度使我明白了，这些理论概念规则定律是在西方土地上在西方几百年大工业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它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必须“本土化”！中国经济，尤其是带有民族地区色彩的中国私人资本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一点，我从每次讲课时私人资本老板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和参与意识中看到得十分真切。但他们需要的是适应于中国的经过本土化的科学理论。我承认，在 90 年代初我所给予他们的不合标准——不合中国标准，不合中国私人资本的实践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与管理理论；传统理论需要更新，西洋理论需要本土化，现有的理论体系需要重构；我们的理论家们、教育家们首先需要改造——要改变旧有的知识结构，改变旧有的研究方式，改变旧有的理论体系，尤其要打破旧有的研究领域，走出象牙之塔，在中国现实经济运动与企业运行中构筑新的理性思辨理论创新的平台。10 多年前我

在原单位做管理学院副院长时，曾鼓励教员们走向市场走向企业，建议对管理教育进行系统改革，从招生面试到毕业实践，从实务教学案例教学到教材编写等等，均从市场与企业经营实践出发。由此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扰乱教学秩序”。越是大校、老校、名校，旧的规制越难打破，1991、1992年我到深圳创办特区最早的MBA，乃至我的出走，多少也与此有关——因为说来也很简单，既然鼓励教师们走向市场，走向企业，我自己就应率先做出示范。不管这条路多么艰难，却是势在必行。而今天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已初步完成了这种改造与转变！因为民企的经营管理者已经接纳和认可我所讲授的理论与实务技术。我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继续进行实务体验与考察的同时，将多年的点滴积累，从实践中提取升华的理论观点编撰成书，希望在本土化的现代理论大厦构建中添加一砖半瓦。

前两重“意想不到”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尚未消除，更沉重的打击紧随其后。新“官”上任总得给点“面子”和加盟的“蜜月”并没有延续多久，由家族与地缘情感编织的“阻抗”便开始形成了。初始我十分郁闷，但渐渐开始明白：这么多人靠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投奔“福海”，在这里与老板多年艰苦创业，没功劳也有苦劳，更何况有亲缘关系做基础，尚未谋得企业的一“官”半职，而我这个“空降兵”没有任何劳绩，更无任何当地官方权势背景，仅靠着与老板的4次谈话，就坐上了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总经理的宝座，心理的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无组织有意识的讥讽对峙是十分正常的，完全拥护支持反倒是不可思议的。我的心态渐渐平和起来。对问题想得十分清楚：我来此既非谋“官”，又不图“钱”，只图获得最好的调查资源；况且这种“阻抗”本身正是我所需要认知记录、思考分析的对象。因此，面对现实，最好的办法是认真做自己的事，不争不辩一笑了之。不过，使我心理获得些许平衡的是两个方面的意外收获。其中之一就是这种企业文化中如此鲜明的亲缘情感倾向给予我认识家族制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从忠诚成本、人格成本、组织成本、情感成本与风险成本等等的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家族企业做了一次深刻的思考，对中国私人资本家族化有了较深的认识。真是祸福相依，收获之意外

来自于这种家族壁垒给予我的尴尬与刺激。另一个超出我原先设想的收获是对一个商贾世家的真切的了解。罗忠福这个大家族在近一个世纪中三代人一脉相承跌宕盛衰的创业史，极其真实地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私人资本的坎坷历程。从这个家族的盛衰变迁之中，我不仅看到了中国私人资本在近代、现代乃至当代制度文化环境“夹缝”中求生的无数精彩画面，看到似《子夜》中又非《子夜》中，似《上海的早晨》中又非《上海的早晨》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的神姿情态；而且，透过这个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我开始了对中国私人资本的深入的思考。一叶知秋。这个家族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颇耐读的书，一块极富价值的中国私人资本的“活化石”。它给予我的研究的价值是十分宝贵的。多年来许多朋友对我在这家公司滞留7年之久难以理解，今天说明白了，这是最主要的缘由。也正因此，无论是荣是辱，是喜是忧，我始终把握自己精神与行为的舵向，始终要求自己在内心深处保持一种学术的独立与客观。自然，我时时地感到这种无所偏依的艰难。因为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通行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商场上的利益纷争，常使这个家族与其家长蒙受非议，也使我不时被卷入商业冲突与人际纠纷之中。尽管我在诸多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立场，但这并不影响我与家族的多数成员处得颇为友善，从“老太爷”与罗家兄妹对我的礼遇中可以感觉到。不过，我又十分明白，我对这个家族的认识与情感是矛盾的，如同这个家族对我的认识与感情是矛盾的一样。因为双方思考、评价的角度大相径庭。在今天这个价值观念急剧转型而又充满矛盾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极富个性色彩又敏锐地适应着、反映着时代冲突与走向的矛盾阶层，面对这一矛盾阶层的典型代表者，我的情感与价值观也不时处于矛盾之中。这个极富典型色彩的家族几乎携带着它所代表的群体、阶层的一切矛盾与特征——现实的公益追求与冰冷的钱权交易，发自内心的“平民情感”与冷酷现实的身价计较，睿智超前的眼光与斤两必争的难以掩饰的商场算计，坚韧果决的意志力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防范与多疑，勤奋刻苦理智务实与典型的唯我主义，虚纳好学不耻下问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耿介忠直与

虚以委蛇等等。巴尔扎克对自己二元性格的剖露同样适用于这个家族的主要成员,《人间喜剧》中的不少人物在这里都可找到自己的替身和伴侣。10年中我结识了像罗忠福、牟其中、石山麟、冼笃信、李静、汪世华、陆航程、张宏伟、段永基、刘希贵、张春来等等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伴随流逝的时光,他们中的大多数渐渐因失断联系成为远去的记忆,但这一个个充满个性创造力的代表人物及由他们所组合所代表的这个新经济群体,却在我的脑海中变得愈来愈清晰。这个诞生于非常岁月的群体与赋予他们特殊使命与人格的时代一样,体现出矛盾的个性或个性的二元性:理想与实用;清醒与迷茫;因袭古老的传统又在叩击通向新纪元的大门;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不断衍生出创造性的破坏;令人敬佩的坚毅与使命感无奈地伴随着屈从与机会主义……

矛盾的时代塑造了矛盾的群体、矛盾的家族、矛盾的人格,使我的研究不时陷于矛盾的境地。度,太难把握;度,太难描述,因而也才太有价值与意义。也正是这种矛盾,多重的矛盾,使这一个个生命个体、这一群体(阶层)表现出多彩的个性;才使这芸芸众生,使这无情的生存竞争充满了盎然生机,饶多情趣。

接踵而来的“意想不到”是新环境对我的新身份与所做研究的歧视。生存的窘迫,心理的失衡,家族的壁垒,连同这无以寄托的最后的慰藉,使我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福海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被极端者视为“资本家的帮办”;所做的研究被部分论者斥之“为资本家张目”,自珍坚持的理想主义在这里受到无情的嘲弄;昔日外出被礼以“上宾”,今日不少见白眼与冷遇;昔日从事的理论研究成为政策基础与依据,今日研究撰文首先要警惕“立场问题”……

好在对应于我个人的这一切在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风化与个人奋力克矫中渐渐淡去。

但是,这种有着深厚现实利益基础的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精神,还将在中国大地盘桓延续。尽管它仅仅是传统东方关系、精神、制度与文明的副产品,可是,只要这种主体关系、制度、文化与文明依然存

在，它就会继续顽强地存在，也许还要几个世纪。

最终，超出我的选择预期的还是选择本身。

从1990年代初在特区与协和集团组建管理学院，在深圳中航技系统试办特区最早的MBA，我个人的业务选择就与创办“新学”联为一体。新的研究方向的选择是为了将私有体制与我所熟悉的国有体制做以比较分析，对现实改革与中国的明天做以更深邃的思考；具体的路径设计是“三位一体”，即边实践边办学边研究；个人的人生设计是准备在当时十分良好的发展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根基移植于更丰富而更具活力的现实之中，使自己在理论与教育领域有所建树。20年前我就自许一生做好3件事：教出一批好学生，写好一本书，办好一所大学。此时，在我的价值判断中绝无“体制内外”一说。直到单位断然做出了釜底抽薪的决定，在愤然出走突陷困厄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新的选择使我走出了“主流体制”，进入了非主流体制和实际还被视为“异类”的群体。一切，过去的一切，旧有的权利、待遇、声誉、关系乃至原拟调任的职位均与我无缘了。昔日的良好“前景”转化为未来发展的迷惘，昔日的追求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昔日的尊重转化为见诸脸面的冰冷与无形的歧视，昔日的“升腾”之势复转为重归社会最底层生存的沉重……传统的功业评价标准与巨大的精神物质反差在我内心中引起的不平衡是强烈甚至是残酷的。

研究方向与路径的调整一下子演变为个人命运的根本变化，我的后半生由此转入新的轨迹。从此，我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出局者”、“体外人”。

我开始成为“独行者”而没有任何依傍。

一切从零开始。

这是最大的始料未及。

两年后，校长到深圳向我道歉，此时，新的轨迹业已笃定铸就无可改变，我已开始看到自己的研究的价值；而一些好心者的怜悯，更使我于感激之余下决心闯出一条新路。

随着研究环境研究基础发生根本的转换，由过去的“隔岸观火”变为亲身体会——亲身感悟私有制——我不仅通过经营实践开始重新认识私有经济，而且通过置身于一种“高风险低安全高动力”的机制之中，直接感受私有者的创业心理与行为。在那表面的荣誉、辉煌乃至“霸气”背后，我体会到了私有业主创业的艰辛与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负担；从我生活于其中 20 余年的公有机构“高安全低风险低动力”机制与私有机制的强烈反差中，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国有企业和单位难以有私有企业那样的快速发展和勃勃生机。这种感悟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每时每刻的，而不是片段的；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是生动具体的而非理性虚幻的。由一介书生、国家干部转而成为 1990 年代中国最大的私有企业的总经理。这种身份、境界的巨大反差本身就留给我广阔的思考与价值选择空间。谁能想到昔日的大学教授，会在半夜接到黑社会的恐吓，由此在我内心引发的激撞、惊愕、茫然不知所措与深切的感受，在高等学府中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依旧生活于高楼深院，绝无生存之虞的学者、专家永远无法领悟的。我又哪里又能想到，像我这样的教书匠，竟然与黑社会的龙头老大觥筹交错，而他的公开身份，却是高级统战对象。这是一个红道、白道，黑道奔突消长的领域。“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把各色人等拉到这个舞台上，汇聚在一起，时而反目相向，时而举杯共饮。这里的一切令人备感扑溯迷离——交织着古朴的义气与现代市场冰冷的交易；五彩缤纷炫目的霓虹灯与金风萧瑟之夜讨饭阿婆破索的寒衣；一掷百万千万的豪情潇洒与“垃圾千金”的屈辱抽泣；雪耻百年凌辱的古国雄风与千万打工者求生的焦虑；庄家的黑幕运作与赤诚者理想主义的苦苦追觅；理论殿堂儒雅的自由主义宏论与薰莸并茂五色杂陈的利益博弈……新的环境与存在一方面将我旧有的空泛理论与经验方法打得粉碎，强使我的理论触角深入到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近现代实证性的而非抽象知识化的，冰冷利益算计的而非课堂模拟的现实之中，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现有的理论；一方面则强使我把研究的视野延伸至更加浩瀚的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中，从宏观视角俯瞰中国现实的经济与社会运

动。细致入微的体验与考察使我看到了对象的真实，宏观视野的拓展使我对中国现实改革的历史走向看得更清晰；新的思维方式、思维角度与生活基础，使我开始对中国私人资本有了全新的认识，对西方文明与实际依旧强盛的东方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对西方上流的民主议会制度与“东方治权”主导体系的合理性有了新的认知，对人类的文明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对中国新资本关系的现实与未来看得似乎更加明白。这一切成为我30余年思考的延伸和新的收获。

这10年，是我的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10年，是走出主流体制，感悟私有制，展开新的理论视野的10年；是遭遇诸多“意想不到”从而充满风险、挑战、磨难的10年；也是对自我人生进行重新塑造的10年。这10年的最大收益之一，自然是对中国私有经济与群体的感悟与认知。这种感悟与认知已凝结成我个人生命、理论生命及生命价值的一部分。上百万字的笔记、讲稿、百余篇论文和调研报告，组合成我对中国私人资本及其人格群体的虽然仍十分肤浅但多少系统的认识，形成了有关中国私人资本生命机体的“组织人格化”理论，有关现代企业管理的“生理阶段与经营决策”理论、“扬善抑恶”理论、对“经营者持股”与“经营力资本化”的新认识；同时，一个有关“组织人格学”的理论框架开始形成，这本书中的“人格篇”成为这一新理论体系的基础部分。

这些思想成果是对我这10年艰辛、10年“求索”的“回报”，对我的选择的价值见证，成为我后半生新的人生道路的端启。生命之旅不可回复，但命运的“染色体”却可以修补、重组，使生命获得期望的价值。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到，“追求承认”是人性的基本要素。这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动力。当重归社会底层，再次陷入一层又一层的自上而下的压抑排挤和歧视时，这种基本人性要素便被强烈地激活起来，形成了这10年不竭的动力，连同那初始的目标追求和因心理失衡所引发的“平衡”渴望，演绎出这10年的不懈的实践、探索、磨练、拼搏、学习、思考、积累与创作。从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这10年是“追求承认”的历程，是起自“文革”而不断寻求新价值、新动力和塑造新自我的心路

里程。所不同的是，随着实践转换，几度霜秋，几经变迁，这10年的“追求承认”已渐渐淡化，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即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异质文化平等身份的努力——在我这里，逐步将赋予他人外在的“承认权”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转为赋予自我的“自我承认权”，用于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主观理解、评判、设计、重组、认定与升华。

作为一个小小的副产品，“转换”使我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强化了旧有的一种价值观：过程体验、整合与升华——对生命历程中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价值选择与行为体验，对生命“素材”的目标性整合和人生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升华——是比不断转换的目标更有价值的生命和生命价值的体现。

二 对象：古老群体与新东方文明

这份报告集同时是一束思想笔记，考察的对象是近30年重新崛起的中国私人资本及其人格群体。

10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私人资本的初始积累与形成过程，并依其形成方式与运行特征从不同角度做了多种类型的划分，以期对这一新资本及其人格群体做本质性把握。从交织着历史与现实、变革与传统、衰微群体与新兴阶层不同利益追求、不同关系、精神、制度冲突博弈的经济社会运动中，我将具有私人资本属性的经济群体抽象升华出来归纳为3类：

其一是发生于1970年代后期，在“大返城”就业压力和“权宜之计”的偶然性“制度文化环境”下，通过传统资本积累形式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私人资本；

第二类是发生于1980年代，借助在“双轨制”和早期股份制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与权力，快速完成资本初始转型积累的“亚官商”或“半国有资本”；

第三种是自1990年代以来，以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MBO”实现资

本初始转型积累的“管理层资本”或“新私人资本”。近年中国私人资本新增企业中，这一类型占相当比重。

由于后两者的转型过程还在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究竟是继续保持“亚官商”或“半国有”外形，还是显现真实的私人资本内质，抑或是“混合资本”化，尚受制于未来岁月社会主导者（个人、团队、群体、阶层）对社会资本机构与相关制度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及制度路径选择，其私人资本属性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本书所指“中国私人资本”是第一类多少带有纯粹意义的中小企业私人资本群体。

针对这一新资本及其人格群体，在第二篇第三章，我曾有一段说明性文字：

基于中国的私人资本的重新崛起仅仅不过 20 余年，在当代西方资本关系已较马克思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新的市场经济尚在草创之中，远未构造形成其完整形态和充分显现其内在本质之时，作为东方再度崛起的新资本，其资本关系、资本功能、资本价值、资本运行机制、资本动态结构等等，尚在缓慢显现、构造、形成之中。出于理论的谨慎，仅对这一资本群体人格的“社会属性”、“社会特质”与“社会品质”做谨慎地描述、谨慎地评价、谨慎地预测。

我所深入其中，体验、观察、分析，将 10 年岁月倾注给予的就是这一古老而新颖，重新崛起却又在成长中，远未定型，自然可塑、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群体及其人格。

对象的不确定性，使我的考察分析充满了不确定性，使抽象升华过程变的颇多歧境、迷茫与艰难……

当笔锋划破时空，穿越历史的林莽，岁月流光在笔下纷逝远去，心中愈发有一种凝重甚至困惑。这一方面是因为要为一种古老而又新颖的制度，一个长期被视为“另类”的群体做出具有时间价值的论断，实非易

事；一方面则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时有山重水复之感，思维的张力似乎总跟不上问题的快速增添；多方考察的对象刚刚在脑海中“成相”，飞来之雾又将其环绕笼罩起来，让人产生一种朦胧陌生之感。对这一古老而又幼弱的群体的研究正是如此。

就在思维追随时光，巡视千年，最终驻足于新世纪中国私人资本经营者群体身上时，似乎一切于我都已是明明白白的——这个古老群体自先秦时代定位于第四等身阶，而后便百代不移，士农不伍，官商压抑，历经风霜，竟百折不摧。至晚清随“洋务”重起，虽依旧亦步亦趋于官府官商，却不时在救亡维新大潮中见其特立独行之骁勇义举。纪元更新，清廷力倡商务，松缓钳制，辛亥前后，这一群体所执控之经济进入了秦汉以降少有的“黄金发展期”，于国计民生，多所建树；甚至一反数千年之格局，国民总值竟然超官商而过半，实为中华经济政治史之创举。然而，昙花一现，民元之役虽开共和之风，并被后人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却高扬“节制资本”之旗，强化国家垄断，至1945年，最终复归2000余年官商民营之旧制。到1950年代后期，干脆将其扫荡得一干二净。不过，总是野火烧不尽，历史似乎并不习惯于这种单一纯净状态。究竟是何种人性本源之力使古老民商若枯木逢春，与其他变革力量共同推动中国进入“百年中兴”姑且不论，在秦汉以降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期”，其于国于民之显赫业绩，已很难再将其作为“万恶之源”加以封杀。至于《共产党宣言》新译本重定“扬弃私有制”以代“消灭私有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路标转换，其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这个重新崛起的群体及所代表的经济形态还很幼弱，尚处在自身生命“新周期”的幼年阶段；对中国私人资本而言，外部环境仍是制约其发展的第一力量，我称之为“外生力>内生力”，即外部生存环境制约力大于内在生存原动力。处于这一环境之中，中国私人资本经营者群体必须增强自身体质，增强经济实力，在不断健全完善外在经营体制，创建新的资本人格、“资本公正”的同时，超越和提升内在人格素质与外部社会地位，以更强的资本实力，更优良的资本人格去影响，去争取更公正合理的外部经